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曹 禺

CAO YU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曹 禺代表作

田本相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曹 禺 代 表 作

田本相 编 责任编辑 曲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市邙山书刊商标装璜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125 插页 字数 479 千字
198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6,000—11,000

ISBN7-215-01517-3/I·100 定价:22.80 元



作者

水文院毕业“留子”，电影
“留子”，大约从我十九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萌
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几年话剧，同时已编戏，导演戏。
接触不少中国和国外的名戏，眼界开拓了我的眼界，并属
一些舞台实践与作家经验。但我的心事像在一团烟雾与火烟
的沙漠里，^最雨^要度几阵，^希立刻蒸发于空，又于无烟网起
来，我不知怎样往前走去献酬的乡了。

我开始日夜摸索，睡着或梦着，像星眺空见时有时
些朦胧的幻影。漫长的时光啊！^要古^地眼前后生从^后
望眼里生出一根苍绿的嫩芽——我要写作。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那个人的选择困难的
境遇中，我未见过，门别过多少使我思来的人路不无志。
每过无天的履更使我愤怒，冤屈至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
使我这下痛心的眼淚。我有无数的人需要刻画，不少的罪
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痛苦的^海人海里，我要
攀上高山之巅，^任任^细细^中穿，^断断^断断^作作^人的东西
是美是德，究竟有怎样^的个性与灵魂。

从下种到结成果实，大约有五六年，这段写作的时间
时光是在我的母校——永远使我怀念的南开大学度过的。
我写了许许多多的小传，共四卷本，止“惜雨”十八人。

上海电影制片厂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茨璧

前 言

曹禺是我国杰出的戏剧家。他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新兴的话剧事业。他的话剧创作驰名中外，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原籍湖北省潜江县。一九一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生在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

曹禺的童年时代、学生时代，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勃起和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正是“五四”新文学以及话剧运动勃兴的时代。曹禺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和文学背景下，度过了他的创作准备时期而成长为一个剧作家的。

曹禺的家庭是一个令人郁闷窒息的封建大家庭。他曾说：“我生在一个曾经阔绰过，后来又没落了的家庭里。少爷们有自己的佣人，自己的书房。住的相当舒服，但是闷得很。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每天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象周朴园逼紫漪喝药那类事情，从我的亲戚，朋友的口里经常可以听到。”（张葆莘：《曹禺谈剧作》）这种令人郁闷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对封建的家庭秩序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感情。

他的父亲曾在日本士官学校读过书，后来也做过官，但却喜欢诗文，时而牢骚满腹，倒象是个怀才不遇的文人。由于他父亲的关系，使曹禺得以熟悉一些封建官僚买办的家庭，熟悉和了解这些家庭中的许多人和事，而且熟悉这些家庭在社会急剧变革中的兴衰变迁。这些，就成为他创作《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剧本的题材来源。

曹禺先是在封建私塾里读书。因为他的父母并不顽固，允许他看“闲书”，如《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这就培养了他最初的文学兴趣。值得提起的，是小时候母亲经常带他到戏园里去看戏。那时，北平和天津荟集着北方著名的剧种，如京剧、河北梆子、曲艺以及文明戏等。后来，他在京津求学时期，也曾观赏过许多著名表演艺术家的演出，如龚云甫、陈德霖、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等。这些艺术家的戏使他看入了迷。他看戏回来还和小朋友们一起模拟扮演，他发现“戏原来是这样一个好迷人的东西！”他说：“小时候，我很想当演员，想一辈子当演员。”可见，在他童稚的心田里已经播下了热爱戏剧的种子。

一九二二年秋，他进入全国闻名的南开中学读书。曹禺在这里读书期间，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处于高潮时期。虽然北方还处于军阀统治下，但是，一些重要的事件都在南开中学引起强烈反响。曹禺就亲自参加过支援“五卅”爱国反帝运动的宣传演出活动。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也给他以鼓舞。这些，对他后来决心以话剧创作来“改变社会”产生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南开中学可以说是曹禺从事话剧创作的摇篮，为他后来终生投身戏剧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曹禺在中学时代是一个课外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学校也为学生提供了较多的课外活动阵地。他曾经是文学会的会员，还担任过校刊《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他喜欢文学创作，早在一九二六年他就和朋友创办了《庸报》的副刊《玄背》。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用曹禺这个笔名写下了小说：《今霄酒醒何处》。这篇小说可明显看到郁达夫的影响。他还喜欢写新诗，如他写的《南风曲》、《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不久长》等，闪烁着他的艺术才华。曹禺还参加了南开新剧团，曾经演过不少话剧，如霍普特曼的《织工》，丁西林的《压迫》，还有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和《娜拉》等。在演戏实践中，他逐渐懂得了戏剧的战斗作用，懂得了戏剧和群众的关系，更熟悉了舞台艺术的特点，这给他后来从事话剧创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使他由此树立了献身戏剧事业的决心。

一九二八年秋，曹禺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一九三一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大学阶段，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戏剧作品。他阅读了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的作品，特别喜爱埃斯库罗斯悲剧那种雄伟而浑厚的风格。他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学习观察现实的本领及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他几乎把英文版的易卜生全集通读了一遍，还读了契诃夫、高尔基、肖伯纳的剧本。他尤其喜爱契诃夫的小说与戏剧，曾陶醉于契诃夫那深邃隽永的艺术之中。美国作家奥尼尔的作品也使他十分欣赏。此外，他还浏览了十九世纪英、法、俄等国著名作家的作品。总之，在他创作《雷雨》之前，已读了大量的世界著名剧作，这就大大地开拓了他的艺术视野，丰富了他的艺术修养。

应当说，给他影响更深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他曾说：易卜生的作品虽然是非常深刻动人的，但“无论如何不能使

我象读‘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一样的喜爱。大约因为国情不同，时代也不一样吧。甚至读了《官场现形记》一类清末谴责小说，都使我的血沸腾起来要和旧势力拼杀一下。”他说，这些作品使他“找到了反抗和叛逆的勇气”，也使他“懂得了当时的社会是不能与之共存的，否则只有被吞噬，死去”。可以说，曹禺的戏剧创作是在“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中培育起来的。

一九三三年，曹禺写完了《雷雨》。当这部从中学时代就开始酝酿构思，历经数载孕育的产儿终于诞生时，使他感到无限的欢悦和兴奋。而其时，他还不过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大学生。《雷雨》的问世，宣告了一位杰出的剧作家的诞生。

二

《雷雨》标志了曹禺创作道路的起点，接着一九三五年发表了《日出》，一九三六年创作了《原野》。这段时间，是曹禺的现实主义剧作蓬勃发展、大胆探索的阶段。

最先发现《雷雨》的是巴金。巴金读过《雷雨》的手稿，他便被感动了，而且热情地推荐给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很快便发表在该刊一九三四年第一卷第三期上。这成为文学史上一段佳话。《雷雨》发表不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便在日译本的序言中，称它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三十年代末期在上海演出《雷雨》，一时“震惊剧坛”，茅盾曾有“当年海上惊雷雨”之赞。在当时的话剧舞台上，就观众对一部剧作的欢迎程度来看，还没有能同《雷雨》相媲美的。究其根由，固然《雷雨》以其大胆而巧合的戏剧情节引人入胜；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它现实主义的

艺术力量，震撼着人们的心弦。透过那些血缘关系之间的复杂纠葛，它真实地反映出深刻的阶级关系，透露出那畸形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消息。作家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富有生动个性的典型形象。特别是繁漪的形象。作家以刻削自如的雕塑家的笔法，刻划出她那种特有的阴鸷、乖戾、极端的性格。她的一生折射出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说明了在当时追求自由与爱情，即便是一个资产阶级女性也是不可能的。而周朴园这个资本家却扮演着封建暴君的角色，他的典型性，深刻地反映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成长的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有着深刻的联系，揭示出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力量。而《雷雨》的现实主义杰出之处，在于它从被压迫群众的角度提出被压迫人们的悲剧命运的课题。从侍萍、四凤身上爆发出奴隶们的声音。鲁大海的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社会的底层正汹涌着反抗的浪潮。这些，就使《雷雨》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而有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亮色。《雷雨》中激荡着作家的热情，他把那种雷雨般的热情熔铸在作品中，显示着特有的抒情风格，也具有诗一样的戏剧境界。剧作家把他的热情和苦闷都戏剧化了。当我们看到《雷雨》中那种奋力挣扎的呐喊，象闪电一样劈向旧的社会；同时，也看到了深深烙印在作家心中的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印痕。

曹禺写完《雷雨》，就在清华大学毕业了。一九三四年秋，他又回到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外文系任教授。急剧辗转的生活，使他的生活视野扩大了，罪恶的社会现实更使他焦灼不安。他说：“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不平之感。”（《日出·跋》）于是，他于一九三五年写出《日

出》，写出他所看到的、感到的、滴着鲜血的都市社会。

曹禺是一个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勇于探索的作家。如果说《雷雨》中还表现出作家带着某种不可知的唯心观念对现实作出窥视和探索，终不免流露出某些神秘的色彩，那么，在《日出》中，作家就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对现实力求作出他的回答。这种探索的自觉性，使他在创作上“探求一次新路”。探求一条向着革命现实主义接近和靠拢的道路，对那“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吃人社会作出更广泛而深刻的概括。他在《日出·跋》中说，这个“不公平的禽兽世界”，“应该改造或者根本推翻”。这种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特色的思想，直接决定着《日出》的战斗面貌。

《日出》现实主义的深刻性，首先表现在作家把他的艺术注意力集中在对那个金融都市社会机体的全部腐烂的描绘上，表明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社会，他把它全部彻底地否定了。他还进一步揭示出来，这个社会腐烂的“症结”应“归在整个制度的腐败上”。《日出》提出的课题较之《雷雨》更为广泛和深刻。他怀着神圣的道德感情揭示出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的地位和命运，尖锐地揭露了卖淫制度。他猛烈抨击了象金八那样的金融买办势力，抨击了金钱制度对整个社会的毒化，把道德、爱情、人格都恶毒地颠倒了、扭曲了。特别是他站在那些“可怜的动物”的立场上，来揭露这些社会罪恶，就使《日出》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日出》可以说是三十年代畸形都市社会的一面镜子。从这社会的动荡和瓦解的声音中，预示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家说，我写《日出》“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日出·跋》）这就使《日出》的现实主义别具特色，即充满着一种理想的温热和浪漫的诗情。在全剧的艺术构思中，富于诗意的主题潜流着渗透着。这种温暖的诗

情，使他善于揭示污秽掩盖下的诗意真实，从腐尸的气息中看到生命的跃动，从地狱中发现金子的闪光。陈白露、翠喜这些被蹂躏的妇女，作家都揭示出她们有着一颗“金子似的心”。在陈白露、翠喜、小东西的悲剧命运中，深刻地暴露出三十年代都市社会的罪恶。特别是陈白露，作家通过这个杰出的典型，揭示出吃人的社会制度是怎样把一个追求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女性逼到精神崩溃，最终走上自杀的道路。作家虽不能为人们指出一条出路；但是，那满天大红的曙色，那高亢的讴歌却暗示人们去追求光明和希望。《日出》的艺术较之《雷雨》也更为成熟了，它没有那种斧凿的痕迹，他把悲剧、喜剧和抒情结合起来，用丰富的戏剧色彩来反映复杂的现实生活。《日出》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赢得《大公报》一九三七年文艺奖。

一九三六年，曹禺创作了《原野》。此剧先发表在靳以主编的《文丛》上，一九三七年八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了单行本。

《原野》是曹禺积极探索农民问题的产儿。它描写一个农民仇虎复仇的悲剧故事。剧中跃动着作家对黑暗社会的反抗热情，流露出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反映了农村阶级压迫的某些现实状况。曹禺说：《原野》“这个戏写的是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战初期，在农村里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五四运动和新的思潮还没有开始，共产党还未建立。在农村里，谁有枪，谁就是霸主。农民处在一种万分黑暗、痛苦、想反抗，但又找不到出路的状态中。”（张葆莘：《曹禺谈剧作》）作者通过仇虎形象表达了自己对农民问题的积极思考。这部剧作，受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方法和技巧的影响。就艺术技巧来说，《原野》表现了作家已经纯熟地掌握了戏剧艺术的规律和技巧。

三

抗日战争开始，曹禺的戏剧创作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抗战八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曹禺的创作道路也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曹禺的现实主义深化的阶段。

一九三八年，曹禺和宋之的合作创作了《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此刻正是武汉失守前夕，因此，他们把“总动员来参加抗战工作，打破日寇侵略的迷梦”，“肃清汉奸，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动员全民服役抗战”，（曹禺：《黑字二十八·序》）作为写作的主题。此剧因根据一个庞大的演员名单而写，故人物众多，剧情比较曲折。但因过于追求这些，致使人物陷入纷繁的头绪之中。不过，此剧却表现了作家的抗战热情。曹禺不但担任导演，而且还扮演了剧中的侯风元这一角色。

一九三九年在四川江安曹禺创作了《蜕变》，这是作家满怀热情写的一部为抗战服务的力作。这个剧作通过一个后方省立医院的腐败揭露了国民党机构中徇私枉法、因循怠惰、投机倒把、贪污舞弊的丑恶现象。他直接提出抗战现实中的政治课题，触及了国民党的官僚制度，这是曹禺过去剧作中未曾有过的新的因素。正因如此，它一上演便遭到刁难，甚至连蒋介石都亲自出马过问，可见它触到了国民党黑暗政治的痛处。但更足以表现作家思想进展的，是他对“新的生命”的歌唱。他不但塑造了象丁大夫那样献身于抗战的白衣战士，更塑造了象梁公仰那样具有共产党人的某些优秀品质的新官吏形象。作家说，他是从徐特立同志身上得到启示和鼓舞而写《蜕变》的。这些，使《蜕变》的现实主

义有了新的特色。但是《蜕变》是有弱点的。他把社会的“蜕变”看得象自然界的蝉那样新陈代谢，“只有忍痛蜕掉一层腐旧的躯壳，新的愉快的生命才能降生，”（曹禺：《关于“蜕变”二字》）。这未免过于浮浅了。不经过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的政权，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蜕变”。应当说，作家当时是过于乐观了。此剧当时演出效果很好，鼓舞了抗战的人们。如若干剧团在上海孤岛演出此剧时，上演一个月连续满座。有时台上台下一起沸腾，呼着爱国口号，十分感人。因此，洪深把《蜕变》列为“十部必须阅读的抗战剧本”之一。

抗战初期出现的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很快就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蒋介石背弃抗日、民主的诺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统区是一个特务横行、贪污成风的腐朽黑暗的世界，对进步文化事业极力予以摧残和迫害。曹禺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更加清醒了。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关心和教诲，使他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的确，如他所说，他还不懂得革命，但是“我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曹禺选集·后记》）他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和心情下，于一九四〇年秋天创作了《北京人》。

如果只是看到《北京人》的沉郁的抒情气氛和悲怆的调子，是很容易把它看作是悲剧的，而《北京人》却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抒情喜剧。无论就其思想和艺术来说，它都是曹禺解放前戏剧创作的高峰。它虽然描写的是抗战前一个衰败的封建大家庭，但是作家却从曾家这个如同棺材般的封闭世界里，表现出整个封建制度腐朽垂死的必然性与喜剧性。而尤为深刻之处，是作家从这个小小的家庭震荡崩溃的图景中，揭示了生活发展的趋势：生活是这样发展着，腐朽的走向衰亡，新生的走向胜利，一切都朝着自身的反面走去。作家笔下的生活具有一种绵密的生活发展的逻辑力

量。从瑞贞和慷方的形象中，使人听到嫩芽底欣然破土而出的声音，预示着新的生活潮流正在冲击着冰封的河床，迎来即将解冻的春天。作家是笑着同旧制度诀别的，更满怀希望迎接未来。当他已经看到了革命在什么地方，就使他对现实的反映渗透着信心和力量。这出戏的艺术成就很高，它是这样地“平铺直叙”，一切都显得自然、逼真、熨贴、和谐。他那种善于刻划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法，使每个人物都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一个个都有活人的灵魂，有着他们各自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它那抒情喜剧的特色，更是突出地表现了悲剧形式掩盖下的喜剧内容，在悲怆中有着严峻的讽刺力量。而《北京人》在描写冲突，刻划人物，渲染氛围上更具有民族风格和气魄。茅盾曾说：“绝不能低估《北京人》的价值，低估它的社会意义。”（《读〈北京人〉》）

在此期间，曹禺还根据Niggli的 *The Red Velvet Goad* 改编了一个独幕剧《正在想》。还发表过戏剧论文，《我们的表演基本训练的方针和方法》等。一九四二年，他把巴金的《家》改编为剧本。话剧《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编的成就，他为把长篇小说改编为话剧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二是在艺术上，他对戏剧诗的探索有了新的突破。早在《雷雨》、《日出》中，曹禺的现实主义就显示着作家善于揭示污秽掩盖下的诗意真实，而《北京人》里则更着力地发掘现实中的优美诗意。巴金的《家》是激扬着青春和爱情的热流的。曹禺在改编的剧本《家》中把艺术注意力倾注在对青春和爱情优美诗意的开掘上。他把爱情写得那样富于青春的活力和具有温馨的诗意，这不能不说是剧作家的一个贡献。也就在这一年，他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柔密欧和幽丽叶》。不知是《家》的创作启发了他那富于诗情的翻译，还是莎剧的诗意影响了《家》的改编的。